

**石云龙：老子著解嫫祖--黄帝源自远古蜀文明**
----老子隐意著《山海经》新论

石云龙（四川盐亭）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绵阳日报社, 绵阳, 四川 621000, 中国, y-tx@163.com

摘要：笔者新释老子隐意著《山海经》，记载黄帝曾留岷山、嫫祖出生在川北盐亭县---远古巴蜀文明史，变冤案史因果新论，正如李学勤教授曾说：“过去有人说四川古属西南蛮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西南蛮夷这项黑帽子，是长期强加在黄帝时期前就早已开发的古蜀国头上的”。三星堆遗址为给古蜀国平反昭雪可作有力佐证。

[石云龙 **石云龙：老子著解嫫祖--黄帝源自远古蜀文明---老子隐意著《山海经》新论**. *Academ Arena* 2022;14(8):21-34].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05. doi:[10.7537/marsaaj140822.05](https://doi.org/10.7537/marsaaj140822.05).

关键词：老子、山海经、嫫祖、黄帝、远古联合国、三星堆**【0、引言】**

徐道一教授说：“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争议较多”。例如，四川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曾认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他并以盐亭县榨溪河两岸，距今 8000 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

由此何拔儒说：“中华文明是多源一体，但也存在各个时期的顶尖优势”。他举例：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的大围坪和山寨地质地貌，说明 5000 年前四川曾发生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而中华民族的开国先王盘古等，就是在这个盆塞海的搏斗中，开创了更多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早形成于盘古开天地，氏羌人仅是蜀人的来源之一；而且在“盘古王表”中，约公元前 5770 至 4070 年，蜀山氏就有 6 代掌握这个优势，而做过中华上古时期的首领。为此何拔儒和很多朋友常争得面红耳赤。

但在张澜等人的调停下，大家相约：多在各处办存古学校，多搞类似培养人才的基金会，让他们的后人去争论解决。由此决策，在盐亭，王济钦、杜润之、范蜀林、吴家义、任望南、赵鸿儒等一批革新人士聚集在他们周围，而在基金会的资助下，蒙文通、袁诗尧、蒙思明、何希唐、范仲纯、袁焕章、岳鹏程、谢趣生、王剑清等一批后生，被送进存古学堂或到国外留学。何拔儒和众多盐亭学人在研读老子的《道德经》和周易时，发现老子隐意著《山海经》是在新论远古蜀文明变冤案史因---从“法自然”联想自然全息：“鸟”有孵抱期和迁徙期延伸到人类早期社会---也有由合到分，由分到合两种集群社会现象---在大范围存在走世界大同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形态，和走国家、民族以各自的利益纷争的世界分裂的多元形态。

他认为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 8000 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在农耕文明产生之前，嫫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然而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再到约五千年后的“湖广填四川”，古巴蜀文明已经历数十次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兴衰轮回、起伏振荡---这些史事有案可查，最为人知可从汉朝说起。

汉初，文翁补建嫫轩宫。司马迁续承孔子所著《五帝德》及《帝系姓》，阐述黄帝及其子孙在古蜀国的传承信息。但两司马编的是神话故事，揭露舜

驱四凶的错误。只有刘向父子，校正《山海经》，才揭示锁定黄帝活动在岷山。当然，在战国时期屈原的《天问》，早为鲧治水主持公道。扬雄的《蜀王本纪》，也阐述黄帝在古蜀国的光辉业绩，等等。但古蜀国文明史，仍已变成几千年的冤案史。

新论远古蜀文明冤案史因，笔者石云龙，特选将自费出版的《老子隐意著〈山海经〉》书中“第二十三集”等篇目内容作介绍。

【1、三星堆给远古巴蜀文明平反昭雪是有力佐证】

古蜀国虽然远距《尚书·禹贡》冀州王城五千里，但李学勤教授早在生前就曾说：“过去有人说四川古属西南蛮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西南蛮夷这项黑帽子，是长期强加在黄帝时就已开法的古蜀国头上的。三星堆遗址可为给古蜀国平反昭雪作有力佐证”。

《参考消息》驻成都记者李倩薇和童芳，在2014年4月1日发的特稿《三星堆与世界古文明的“对话”》，见证中华文明开放多元化——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不仅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等有着紧密联系，也与古代多个国家有文明的交流往来。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在新发现的六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大量重要文物。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谲，让人们发出“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感叹。迄今三星堆历次考古出土的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和象牙等数量已超过5万件，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此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位于1、2号“祭祀坑”旁。专家认为，目前这八个“祭祀坑”整体构成祭祀区，是古蜀王国蚕丛用来祭祀天地、祭祀祖先黄帝，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新一批文物的出土，给人们带来更多惊喜。

考古学家认为，辉煌璀璨的三星堆文明驳斥了古代四川是闭塞落后“蛮夷之地”的固有认知，这些新考古发现有力地阐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不仅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等有着紧密联系，也与古代多个国家有着文明的交流往来，这个交流，不是中原文化，而是古蜀国文化，古蜀文明就是中华文明。

1、不同文明“异曲同工”之妙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映福告诉记者：“上述地区出土权杖的形制、材质虽然多样，但应该都是神权、王权的表达物。这不仅反映出存在实物交流形式，也反映出存在跨地区观念的交流”。通过

考古发现的遗物，可以看出三星堆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有一些相通之处。比如三星堆发现的金杖、金面具等遗物，在埃及和西亚、中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土文物中都有发现。

此次三星堆5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半张金面具重量约为280克，预计完整的总重超过500克。此前1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上有鸟、弓箭、鱼和戴冠人头像图案。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代表王权的“图腾”，可能与传说中的古蜀王鱼凫王有关。三星堆金面具、金杖、青铜人像等在黄河下游流域中原地区少见，也与埃及、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形象判然有别，这是古蜀王国对“众神”极具想象力的艺术表达。李映福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的古文明往往有比较发达的宗教系统，三星堆也是如此，出土的金面具、权杖就是重要表征。

但三星堆的面具形象、使用方法又体现出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独特性。“是不同文明之间确有实质联系，还是分别独立发展心有灵犀的‘巧合’，期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带给我们答案”。

2、千里之外发现同款“遗物”

三星堆遗址中还发现了数千枚海贝。三星堆地处内陆，与海洋相隔千里，怎么会发现海贝，数量还如此巨大。对此，李映福说：“这是三星堆这一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流联系的见证，即使相隔千山万水，也未能阻隔大陆与大海的交往。”

许杰说，海贝是三星堆文明与印度洋文明之间进行远程贸易的重要证明，“四川虽为四周环山的盆地，但有四条大河奔流不息。在古代，河流是对外交流非常重要的渠道”。不仅如此，与三星堆相距1000公里以外的越南，还发现了玉牙璋、玉璧、玉琮、陶豆等大量与三星堆相同的器物。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前往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考古发掘。

工作近三个月，发掘出与三星堆同时期并且有一定文化联系的一批遗物遗迹。带队进行此次发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长高大伦研究员认为：“如果两个地方、两个文化没有交流，怎么能有如此相近的遗物？所以，它们一定有交流、有影响。”这是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界“走出国门第一铲”。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四川是我国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区域，自古就是一个沟通南北东西、境内和境外的重要区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早在夏商时期，三星堆、金沙文化就向南到达越南北部一带，南方丝绸之路则是古蜀文明与东南亚、南亚交流的重要通道。

3、中华文明的金色“名片”

“三星堆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颜值’担当，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2001年时任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许杰首次将三星堆文明带到北美地区，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地开展“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文物展”，神秘的三星堆文物在大洋彼岸引起轰动。

据四川省文物局介绍，截至目前，三星堆文物先后70余次出境展览，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等众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100余座城市，观众逾1000万人次。

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说：“对我们这些外国学者而言，中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而这种模式或许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就已显现。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先人所作出的贡献，理解早期欧亚各文明之间的异同……中华文明自古是开放、多元、交流互鉴的。作为中国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三星堆，正是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及融合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灿烂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代表。而三星堆与其他世界古文明的种种‘互动’‘对话’表明，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彩与互鉴共鸣”。

4、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年代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1929年该地中兴乡的农民燕某，在他的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1929年是一个好日期——盐亭县赵蕤故里——今西部花都高团村葱柏岭，亦于1929年发掘一块碑文，类似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文字，上面记载黄帝妻雷祖的名讳。

三星堆遗址直到1986年两座器物坑被发现，一鸣惊天下，吸引国内外学术界的目光，从此进一步拉开了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大幕，一幕赛一幕，幕幕更惊人。据2021年4月1日《参考消息》报导：“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不仅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等有着紧密联系，更重要的是与世界古代多个国家有文明的交流往来。”因此三星堆文明驳斥了古代四川是“西戎南蛮之地”的固有认知，对古蜀文明得到正本清源。

三星堆出土的遗物以青铜器、玉璧、圭为主体，其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前，这时属于我国夏朝中晚期或殷商的初期，因此纠正了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的错误说法。

二里头遗址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但与三星堆出土的遗物，不仅数量悬殊，而

且形像各异——1986年三星堆发现的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立人，青铜神树，戴黄金面罩的铜人头像，玉琮、玉璧、金箔，象牙等，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谲，让人们发出“沉睡几千年，一醒惊天下”的感叹。迄今三星堆历次考古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象牙和海贝等数量，已超过5万件，是全国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此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位于1、2号祭祀坑旁。专家认为目前这八个祭祀坑，整体构成祭祀区，是古蜀王国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地，新一批文物的出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考古学家认为，辉煌璀璨的三星堆文明驳斥了古代四川是闭塞落后的“蛮夷之地”的固有认知。李学勤教授2005年11月24日为《三星堆研究》写序所言：“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蛮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艰难，与中原华夏隔绝不通。尽管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还有佚文存留，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设专篇记述，但由于其间多杂以神话传说，被不少学者斥为不可凭信，四川古史成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

【2、国家领导人考察三星堆考古现场的意义】

2021年4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三星堆考古现场，指示发掘好，保护好，研究好这笔中原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座巨大的灰色钢结构“考古大棚”内，身着防护服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坑内趴在悬空的操作台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着。李克强来到发掘现场，现场负责人介绍三星堆此次考古发掘又有新的重大发现。总理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并仔细察看发掘现场后作重要指示：

“我看到这么多学科的年轻学者，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仍然专注于考古事业，心还是静的，这很不容易。你们在现代社会发掘古代遗址，实际上是在发现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根基。从早年的殷墟发掘，到二里头，再到今天三星堆的大面积发掘，你们要仔细比较、研究其中的关系。”李克强说，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光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要开放性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发掘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发现。考证文化根脉目的是为了鼎新，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通过考古使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三星堆的金色“名片”，把三星堆青铜文化推上了最高峰。在考古史和古史研究上，是划时代的新篇章。

李克强是身居高位的国务院总理，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之托，考查史无前例的三星堆文化，作重要指示——纠正古蜀

国是西南蛮夷之地的固有认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划时代的新篇章----为什么说是划时代的新篇章呢?

因为三星堆文化就是黄帝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五帝本纪》首言: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卜,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是为帝颛顼。

黄帝故里轩辕之丘在岷山,《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江”即岷江,“山”即岷山。其意是住居在岷江流域,岷山的南边很吉利。即今成都平原。说明黄帝故里在岷山。嫫祖故里西陵氏在今盐亭县。《山海经·西次一经》云:“蟠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江。”相传嫫祖是伏羲氏族的后裔,伏羲生于成纪,成纪位于陇南的蟠冢山,今嘉陵江,是古代之西汉水,嫫祖的先祖顺西汉水定居在盐亭,盐亭在西汉水之西,故称“西陵氏”。

青阳降居江水,江水即岷江,指宝墩古城遗址。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即今区雅砻江。雅砻江源头在激外,流经西昌平原注入长江。故此江水、若水皆在蜀。说明黄帝和嫫祖都诞生在古蜀,故三星堆遗址就是黄帝的遗址。

《史记·夏本纪》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历代注家注《史记》唐张守节引《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地域,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

广柔,隋改曰汶川。据以上文献说明黄帝和嫫祖他们的故乡都在古蜀国。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不能征。于是轩辕以征不享。后来炎帝在北方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抚万民,与嫫祖北上华北平原,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后来蚩尤又在华北平原作乱,不听轩辕之命,于是轩辕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后来黄帝在涿鹿建立了都城,即今天北京之西怀柔县。上文说明中华文明即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由西向东,其根脉在昆仑山即岷山,岷山是黄帝的留居地。其后逐渐东徙,直至华北冀州,最后统一了中原。

《史记·禹贡》冀州:古之九州之一,管辖今天山西省及河北大部,河南北部,辽宁本部等,传

说当时的国都在冀州,所以全国的赋税都从黄河运送至国都的冀州,冀州治所大概在今天石家庄一带。夏禹继承帝位后把国建在夏县,夏县是他的封地,即今天山西的运城县附近。说明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至夏禹的国都在豫北,即今之河南省以北,至西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说了一句天话,黄帝建国都于新郑,后人则捡作封皮当印信,说黄帝建都在新郑。

司马迁著《五帝本纪》结束语云: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皆不传。司马迁说经过他考查,《五帝德》及《帝系姓》都是正确的。不过那些知识浅薄的人,要想给他说明清楚,肯定是很困难的。什么是《五帝德》呢?即《五帝本纪》云: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以上五句即称《五帝之德》。什么是《帝系姓》呢?指黄帝嫫祖的子孙,如:

①黄帝: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一曰青阳,二曰昌意等语。

②颛顼: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生子曰穷蝉。

③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蟠极,蟠极父曰玄器,玄器父曰黄帝。自玄器与蟠极皆不得在帝位。

④帝尧:帝尧者,帝喾之弟也。黄帝之远孙也。

⑤帝舜: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颛顼,颛顼父曰昌意,昌意父曰黄帝,自穷蝉以至瞽叟,皆微为庶人。

以上五代谓之五帝。

⑥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其实鲧之父非是颛顼,而是颛顼之裔未记名为庶民。)

⑦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舜帝封契于商,故曰殷商。

⑧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长好农耕,帝尧举为农师,封弃于邠,号曰后稷,为周之先祖。

以上夏、商、周号称三代。而三代都是黄帝元妃嫫祖的子孙。以上五帝、三代都出于《史记》,而《史记》是为中国之正史,其内容应无非议吗?否----此即古蜀国文明史变成几千年的冤案史的----《嫫祖研究》一书坚持“时空阶梯”说----约公元前3180年轩辕黄帝出生;约公元前3174年未来轩辕黄

帝的元妃嫫祖出生。这是属于第“（六）城邦之美时期”的约公元前4170—3150年：1、仓帝史皇氏，2、柏皇氏（共20代），3、中皇氏（共4代），4、大庭炎帝氏（共5代），5、粟陆氏（共5代），6、昆仑氏（共11代），7、西陵氏（共5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嫫祖）。

以及接第“（七）跃起中原时期”的约公元前3150—2230年：1、轩辕氏（共3代），2、祝融氏（共2代），3、昊英氏（共9代），4、古皇有巢氏（共7代），5、朱襄氏（共3代），6、阴康氏（共3代），7、无怀氏（共6代），8、神农氏（共8代）。而《史记》等“中国之正史”的①黄帝--②颛顼--③帝喾--④帝尧--⑤帝舜--⑥夏禹等五代及“夏禹”，已经是另一“时空阶梯”的属于第“（八）大同王土时期”的约公元前2230—2070年：1、黄帝有熊氏（共3代），2、颛顼，3、帝喾，4、尧，5、舜。

以及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第“（九）夏朝时期”的约公元前2070—1600年：1、禹，2、启，3、太康，4、仲康，5、相，6、少康，7、予，8、槐，9、芒，10、泄，11、不降，12、扃；13、廛，14、孔甲，15、皋，16、发，17、癸。

可见从“轩辕氏黄帝”到“黄帝有熊氏”，是已经相隔约920年。但自从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成功以来，无一那个时期去追求弄清楚“轩辕氏黄帝”到“黄帝有熊氏”之间年谱差异，以致成为数千年的“国际笑话”。国家领导人考察三星堆考古现场的意义，也在于无声地希望结束这种“悲哀”的历史。

【3、四川嫫祖研究要讲科学才能走出死路一条】

自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虽然结束儒者语又言皆不传习的编年史，但直到特别是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在百年的疑古思潮中，疑古者销烟弥漫不仅来自，企图打倒孔家店，否定中国上古史；其实也还来自近110年来没有得到承认的远古王表年表的编年史。

1、意识形态与科学求真之辩

一个国家旅游经济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之一。在我国旅游业被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已在四川及中国西部其它地方得到共识。我们常听说：“没有文化的旅游经济是一种苍白短视的经济，反之，不与经济联姻的纯文化，也是没有生命力和缺乏后劲的。”这里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要提高文化和经济的品味，使两者具有更浓的时代气息。

为此，新形势下的文化研究如果要与国际接轨，就不能离开讨论什么是“意识形态”。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与时俱进，提出“意

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像关系”。他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但这些表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意识”毫无关系；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形象，有时是概念。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是以一种想像的形式来再现他们实际的生存状况的，因而人们在意识形态中的“再现”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跨越式的研究与创新，回答了困扰嫫祖研究近百年来的许多问题：

①自约公元前91年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创纪传体史书范例的《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的帝王，乃至近代的政党，年年岁岁祭祀黄帝、炎帝，为何不去揭示黄帝、炎帝的年谱？任凭谈四千年前有黄帝，五千年前有黄帝，六千年前有黄帝，乃至近年还有作家、学者说三千年前有黄帝，七千年前有黄帝。人能活几千年当几千年的官吗？所谓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社会与父系氏社会，是一种终结古代历史的科学认识吗？

②如果嫫祖和嫫祖文明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为什么得不到司马迁、扬雄以来的史家、学者的承认？中国有句俗语：“怨人穷，恨人富”。从经济发展的相对地域来说，滞后的地区占多数，超前的地区占少数，占多数的滞后是真实的，那么少数的超前就不真实吗？占多数的就代表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占少数但是先进发展方向的就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吗？

③2002年4月12日刘东生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接受被誉为诺贝尔环境奖的“泰勒环境奖”，使中国的黄土沉积成为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第三本书，即中国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250万年，从地质上讲，我国的干旱史也有250万年，这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盐亭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何拔儒也被人尊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之父。但这种与国际人文地理、历史、地质接轨的科学方法，为什么难得到传承？

④如果说北京人头盖骨因丢失，不能做碳1

4 测年实验的话，为什么四川资阳人头骨就在考古学权威手中，也不愿意做？为什么中科院贵阳地球化学所做了资阳人化石同期的乌木等的碳 14 测年，又得不到承认？中国学者对远古史是一种意识形态方法的研究吗？因为中国不但有夏商周的初略年表存在，就是更早期的初略尧年王表、盘古王表也存在，并有公开发表，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视而不见？包括对如在盐亭县出土的 5000 多年前的界碑文字等实物也如此，这是为什么？

⑤何拔儒等盐亭学人早已认识到，中国文明是多源一体，但也存在各期的顶尖优势。这如同一棵伞状大树，它虽是千枝竞发，但相比之下仍能找出顶尖，何拔儒把它运用到中国古文明探源研究上，叫做“分蛋糕理论”。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的说法，这包含了一种“侵略与遏止”现象，即如果把“侵略”一词看成是中性，那么在古代史上，有先进文明侵略落后文明成功，也有落后文明侵略先进文明成功。在远古四川，人类文明发源地的嘉陵江文明，后被崛起的岷江文明侵略；而后，巴蜀文明又被崛起的中原文明侵略；到近代中华农耕文明又被崛起的西方的工业文明所侵略。这是一部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的真实历史，但为什么求生于岷江文明、中原文明地域的很多学者不愿意分这块蛋糕？这是科学的还是意识形态的？

如此等等，还有文字的起源，姓氏的起源，民族的起源，何为凤文化，何为龙文化，都存在是意识形态的方法还是科学的方法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涉及到嫫祖文化与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生命力。所以阿尔都塞才说：意识形态是有幻觉性、扭曲性和假想性的，而应该将它与科学分别开来。因为意识形态是就幻想的现实提出问题，而科学则是就真实的现实提出问题。

2、从说明三星堆遗址与黄帝有密切关系找出路

可喜可歌的是---挽救中国上古文明史的大救星、当代史学大师、北京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学勤，早在 1993 年撰写的《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该文共 17 节，如春雷贯耳。

他在 14 节里说：“《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的讥评，以为是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推求，其中不乏启示。这也就是说，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中华文明的形成，应当有密切关系”---当然提及相隔约 920 年的从“轩辕氏黄帝”到“黄帝有熊氏”的《五帝德》及《帝系姓》等古史书，也不能抹杀，应当得到重视。

从说明三星堆遗址与黄帝有密切关系找出路，自 1993 年至 2005 年 12 年后，李学勤教授为《三星堆研究》撰序：开门见山地讲：“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和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篇章。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蛮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尽管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还有佚文存留，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设专篇记述，但由于其间多杂以神话传说，被不少学者斥为不可信，四川古史成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为什么说曙光越来越照亮了？

因为近年来中国专门成立了历史研究院，盐亭出生的高翔教授，还作了院长兼党委书记。英明的党中央习近平主席，为之祝贺。三星堆文化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国务院李克强总理 2021 年 4 月 19 日专程考察三星堆现场，这是历史的新篇章。

李克强总理在现场强调：“你们在现代社会发掘古代遗址，实际上是在发现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根基。从早年的殷墟发掘，到二里头小面积的开发，再到今天三星堆的大面积发掘，你们要仔细比较、研究其中的关系”。这个关系指的是三星堆文化与黄帝和嫫祖的关系。

李总理进一步指出，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光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与古史学、人类起源学协同配合的结果。要开放性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发掘中进行新的探索，像三星堆遗址特别是青铜器如此众多，与世界文明地区的遗物相比较，不断取得新的发现，从而考证中华文化的根基根脉，目的是为了鼎新，要纠正四川自古只认为是西南蛮夷的观念。通过考古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要发掘好、保护好、研究好三星堆遗址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体现三星堆文化是黄帝和嫫祖遗存的根脉文化。

3. 黄帝与三星堆遗址这个根脉文化在哪里？

(1) 老子隐著《山海经》，条条经文记载黄帝活动在轩辕之丘，在岷山；嫫祖诞生在川北盐亭县。

(2) 西汉末年扬雄著《蜀王本纪》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封其次妃的儿子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国以参与。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地称天府。在周代，蜀国局限于和秦国、巴国交往，虽然供奉王职，却不能和春秋诸国盟会，文字制度也与其他国家不同。

周朝礼崩乐坏的时候，蜀国先称王。有蜀王蚕丛，他的眼睛是竖着的，最早称王。蜀国第二代帝王叫柏灌，接下来的帝王叫鱼凫。后来的蜀王叫杜宇，将国都郫县，别都在瞿上城。巴国称王的时候杜宇称帝。号望帝，恰逢有水灾，蜀国的宰相开明，凿通玉垒山解除了水害，蜀帝杜宇于是将国家、政事委托给他，蜀帝杜宇自己则隐居西山。

开明即位后称丛帝，开明氏九世孙时的另一位开明帝，开始建立宗庙礼仪。老子于开明氏时，隐居古蜀国著《山海经》。

(3) 黄帝的先祖少典氏，早期居住在松藩高原昆仑山东南麓边沿岷山一带。《国语》云：约公元前 2230 年—2140 年第三代黄帝有熊氏“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炎帝；炎帝以姜水成。有蟠氏再生黄帝，以姬水成。成而异德”。姜水姬与江同音，姬水即岷江流域的江水。

(4) 文明的起源李学勤教授云，应以青铜器为座标，能容纳五千人的城市。唐赵蕤撰写嫫祖圣地碑云：嫫祖生前首创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

说明黄帝时期以进入文明时期。制青铜器。《炎黄汇典考古卷》云：冶铜术的产生，改变了自然物质的性能，而创造出一种新物质铜。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冶铜术一般是由红铜发展到青铜的过程，从目前已发现的有限资料来看，铜的发现，以陕西临潼县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黄铜片为最早，距今约 6000 年，据测定黄铜多含铅锌的铜矿石。其后，却未见冶铜工具的遗物和铜器的遗存。

直到 1977 年和 1978 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发掘出铜文化遗址，在 20 号房址发现青铜刀一件，经鉴定为含锡的青铜，经测定后的校正年代为距今约 5200 年。从姜寨仰韶文化遗址的黄铜，到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的青铜，其间年代差距约 1000 年，为何有这些的年代差距呢？也许冶炼铜还有家族保密，不是说他们家族掌握国家级大权，从“轩辕氏黄帝”到“黄帝有熊氏”已经相隔约 920 年吗？

其次推测，也可能是由于冶铜业刚起步，冶炼铜的遗址甚少，难于发现。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除上述的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刀外，在甘肃永登县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中也发现一件残青铜刀。马厂类型之后的齐家文化，年代较晚，但有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相似的平行时期，距今约 4000 年左右。

如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遗址，发现有刀、凿、锥、钻头青铜器和铜渣等。永靖县秦魏家遗址发现有斧、锥、指环和青铜饰等。大河庄遗址有铜匕、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发现有斧、刀、镜等。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遗址发现有青铜镜、指环和铜镜等。齐家文化的铜器经鉴定的有红铜，也有青铜，两件铜镜都是青铜。在中原地区对青铜器中发现的生产工具。时隔一千多年直到殷商时期才发现有青铜器，青铜器只有铲 2 件，镞 2 件，钺 1 件。由此可见青铜器数量甚少。殷代、西周的大墓七处，共发现青铜铲 17 件，其中好好墓有 7 件，说明在中原殷商和西周时期，青铜具还没有大量使用。

4、为什么青藏高原成为我国青铜器的原生地？

一是黄帝的先祖少典氏，最早生活在松藩高原，是著名的山岳民族，岷山又是黄帝的活动地。

二是青藏高原是中国著名的地藏宝库，和田的美玉、固旧的锡、甘肃成县的铝锌矿石，远销东南亚。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成县笔甲山开采铝锌矿。矿石远销日本。铝锌是当今生产芯片的主要原料之一。三星堆的青铜器为什么能名扬海内外？从黄帝的遗物看，应该是不言而喻，是庶人该知的因果关系。

三致于城市：《炎黄汇典·考古卷》记载：近年来，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成都平原，发现了新津县宝墩、都江堰市芒城、温江县鱼凫、郫县古城和崇州双河等 5 座史前时期的古城遗址。城墙的建筑方式，从宝墩城址的解剖，它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为距今 4500 年左右。可追溯到黄帝与嫫祖在岷山的轩辕之丘，完婚后迁至成都平原所建筑的第一座古城遗址，城址平面略成长方形，南北城墙各长约 600 米，东西城墙各长约 1000 米，面积达 60 万平方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址。

轩辕黄帝早年和嫫祖在川北盐亭县青龙山相识相恋，直到在岷山的轩辕之丘才完婚的。再到约公元前 2230 年—2140 年第三代黄帝有熊氏，在宝墩古城，也生两子，长子名叫青阳，次子名叫昌意。故《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等语。

5、四川汶川县布瓦村遗址是黄帝有熊氏诞生地

黄帝有熊氏故里在岷山威州镇布瓦村，位于岷山范围岷江上游四川汶川县威州镇布瓦村遗址，距今约 4160 年，是黄帝有熊氏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亦是纪念取名“轩辕之丘”的有熊氏黄帝诞生地。

《成都晚报》2009 年 6 月 18 日报道。记者从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该所与汶川县、阿坝州文管所联合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在汶川县威州镇发现和确认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布瓦遗址。该遗址距今约 4160 年，与成都宝墩遗址为同一文化体系，是三星堆文化的前身。黄帝有熊氏于岷江上游迁徙至成都平原的传说，于此找到了一定历史依据。说明从有熊氏上溯轩辕氏数代“黄帝的故乡就在汶川”，即是早期的成都人，先祖故乡就在汶川。

据负责此次考古工作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研究部副主任陈剑介绍，为维修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坏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布瓦群碉，2009 年 4 月 29 日开始，汶川县文物管理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布瓦黄泥群碉及民居村寨”田野考古调查工作队，并入驻布瓦村，随后发现和确认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布瓦遗址。

据介绍,布瓦遗址位于汶川县威州镇布瓦村三组(龙山组),岷江与杂谷脑河交汇处附近,地处岷江西岸、杂谷脑河东北岸。分布面积5万平方米,保存较好的中心区面积近1万平方米,海拔高度2100米。遗址表面原为一个斜坡,现已改建为梯田。调查发现的原生文化层厚度0.3-0.5米,上部的晚期覆盖层厚达约3米。

工作队在遗址范围内采集到很多陶片、石器 etc 等遗物,其中磨制的残石斧2件,砺石1件,打制饼形器1件。4800年前的灰坑、红烧土和炭屑堆积等遗迹现象均还存在。考古者告诉记者,采集的陶片特征与成都宝墩遗址属同一体系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前身,均属于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本土文化系统,距今年代约4160年。布瓦遗址将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印证三星堆文化,可能传承于此。

长期从事川西高原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并在岷江上游进行野外考古工作近10年的陈剑告诉记者,经过初期考察判断,处于岷江上游地区的布瓦遗址文化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的渊源,三星堆文化也都传承于此。“正好印证了《山海经》记载黄帝活动地,轩辕之丘在岷山的说法”。那么,汶川县的布瓦遗址就是有熊氏上溯轩辕氏数代黄帝部族,迁来成都之前的居住地之一吗?

记者采访的省社科院历史学研究员表示,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布瓦遗址应为宝墩遗址文化的直接源头之一,具有相当重要的考古价值,表明了蜀文化发生、形成、迁徙、交流、交汇的过程和特征,也是蜀文化从岷山走向成都平原的重要佐证。有熊氏上溯轩辕氏数代黄帝的传说,是真实历史内核的,他们的部族也是存在的,只是被神话化了。“但可以认为布瓦遗址是黄帝部族迁到成都平原之前的故乡!”

采集的陶片特征---陶质陶色:以夹细砂褐肉、黑褐陶、泥质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黑陶、红褐陶等,夹砂陶多为夹较细的石英颗粒;陶器纹饰:包括细绳纹、划纹、细泥条附加堆纹、粗细瓦棱纹、戳印纹、凹弦纹、锯齿状花边口沿装饰等。泥质陶表面多磨光。器形:包括喇叭口长颈壶形器、小口罐、钵、杯等。

以上各条与老子隐意著《山海经》,记载黄帝活动曾在过岷山,是相互吻合的。

6、李学勤教授为三星堆写序言

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研究院,策划编撰的《三星堆研究》丛书,现已开始出版。这套丛书首先把已有的田野考古简报、报告和研究论作,搜集编辑起来,堪称过去工作的综合总结。同时还要面向国内外,继续收录,以推进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化探索的发展。

这是一定会受到学术界欢迎的大好事,主编单

位曾嘱生前的李学勤教授,为丛书写几句话,他自然是不能推辞的。

李学勤教授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蛮夷,而且蜀道艰难。尽管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还有佚文存留,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设专篇记述,但由于其间多杂以神话传说,被不少学者斥为不可凭信,四川古史成为一片空白。

三星堆遗址究竟是在哪一年第一次发现的,有人说当地农民燕道诚,偶然在月亮湾(今真武村)挖到玉石器的时间---自来有1929年和1931年两说。再说1934年,到遗址进行发掘的华西协和大学美国学者葛维汉,在《汉州发掘简报》中引用董笃宜的记录说:“1931年春,我听到当地群众议论:离该地不远,发掘出石刀和石璧”。1949年考古学家郑德坤先生的《四川太平场文化》一文也说:“1931年春,四川汉州太平场的燕先生为其田地装设水车,偶然发现地下一坑石璧和若干玉器”。1979年冯汉骥、童恩正两先生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则说:“1929年该地中兴乡的农民燕某,曾在他的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对,或许无法确证,无论如何,遗址的发现是在中国考古学发现不久的阶段,距今已七十多年了。

《汉州发掘简报》估计遗存年代的“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铜石并用黄帝时代”,即公元前2000年以上。并指出其文化性质“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对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这种观点实际是来自那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

葛维汉的发掘结束不久,闻讯之后的郭沫若先生,向其致函索取有关资料。1934年7月,郭沫若在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的信中说:“你们在广汉发现的工艺品,如方玉、玉璧、玉刀等,一般与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出土器物极相似。这就证明,西蜀(四川)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在殷代甲骨文所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周王作战。此外,在广汉发现的各种陶器是极古老的器型,你们判断为周代早期的文物,也许是可靠的。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有朝一日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这段话所包含的预见,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完全实现。

到建国以后,四川省的考古学者在这处遗址做了大量调查发掘的工作,逐步弄清了遗址的构成和文化的性质,成果是明显的,但还没有引起专业以外人士的注意。直至1986年,遗址内三星堆两座器物坑被发现,一鸣惊人,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目光,就连没有接触过古蜀历史的公众,也都知道三

星堆的大名。

其实三星堆这个词，在《汉州发掘简报》里已经出现。简报记述说：“燕家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似一轮明月，名叫月亮湾……南面较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丘，把它们视作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哪里想到在土墩中，埋藏着如此丰富奇异的珍宝，以致整个遗址最后定名为三星堆遗址，连其所属文化也被称为三星堆文化了。

翻读《三星堆研究》辑录的种种报告和论文，我们应该感谢在这方面辛勤工作、奋力开拓的所有考古学家与有关学科的专家。是他们揭示了三星堆遗址的奥秘，使大家重新看到湮没已三千多年的古蜀文化的灿烂辉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足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比。在海因里希·施里曼发掘之前，特洛伊只是荷马史诗中的神话，在保罗·博塔发掘之前，尼尼微也仅见于基督教《圣经》。《华阳国志》的《蜀志》明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这些话，过去人们大都不相信，甚至以为荒诞谬误，在三星堆发掘以后，才认识到其中确实有着王国维先生说的史实之素地。

因此，我们回顾三星堆遗址发现与研究的历程，不妨考虑一下两个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正确对待富有神话色彩的古史传说？如果由于传说与神话混杂，便予以抹杀否认，就很难正确认识古史了。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适当使用时代较晚的文献材料？

《华阳国志》成书晚至东晋，然而内中保存的传说，却是远有所本。这一点应该对我们于方法的层面上有其启示，但仍较少为人注意到。如果说 1929 或 1931 年燕道诚的发现，和 1934 年华西协和大学的发掘，只是偶然叩击了古蜀文化的门扉的话，经过近五十多年的工作和研究，特别是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以及成都金沙等等新的发现之后，古蜀文化的大门已经是洞开了。

不难预计，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一定会在三星堆和其他地点有更多更重要的新发现，促使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的这套《三星堆研究》丛书，也将会连续出版，而且越编越好。李学勤为三星堆写序的这些内容，理清了中国历史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人们正确对待富有神话色彩的《山海经》。其实《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隐寓言。遗憾 2005 年李学勤还不知道《山海经》的作者是老子隐意所著。

第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西汉末年扬雄著《蜀王本纪》是真实的，揭开了三星堆遗址能

联系黄帝的文明史。

第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有力佐证；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的源头。

第四、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史相比较，尼尼微已仅见于基督教《圣经》，特洛伊只是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而《华阳国志》的《蜀志》明确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人皇即黄帝。

第五，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纠正了传统的看法四川古蜀西南蛮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实了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文明，及其盆塞海干涸造成的后果。

【4、可喜“一唱雄鸡天下白”的三星堆曙光】

遗憾笔者石云龙，是一代无名草民，惟始终坚持一个信念，“真理”始终是真理，总有“一唱雄鸡天下白”的一天。

可喜与三星堆遗址一样，一缕曙光，逐渐会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有特稿言：“不同文明”，“异曲同工之妙”。好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妙在哪里？妙在三星堆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有一些相通之处，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具等遗物在埃及和西亚、中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土文物中都有发现。”

此说：提示了几个重要问题：大家知道埃及位于非洲大陆，以金字塔著称，金字塔建于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相当于中国夏朝初年。然而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是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是我国五帝夏朝早期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立人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神秘群体，相传是古蜀王国群巫集团的生动写照，其中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是大巫或群群巫之长与蜀王的象征。它们代表的应是古蜀族和古蜀国宗教首领阶层，同时也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既代表着神权，又是王的化身，说明远隔重洋的埃及或西亚和东亚发现的金杖、金面具，它铸造的源生地，是在古蜀国，从古蜀国流传到埃及或东亚和西亚。

说明古蜀文明，古蜀文化从夏商就传播到西亚、东亚和非洲大陆的埃及，应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有特稿言：“千里之外发现同款遗物”。三星堆遗址中还发现了数千枚海贝。三星堆地处内陆，与海洋相隔千里，怎么会发现海贝，数量还如此巨大？

答案只有一个，说明三星堆这一大陆文明与海洋国家，殷商以来就有密切交往，即使相隔千山万水，也未能阻隔古蜀国与大海的交往。

海贝是三星堆文明与印度洋文明之间进行远程贸易的重要证明，四川虽为四周环山的盆地，但有四条大河奔流不息，在古代河流是对外交流非常重要的渠道。如长江是亚洲第一条大江，横贯西南

各省，水利资源丰富，灌溉、航运都很发达。

但在上世纪疑古思潮中，盐亭学人、川大蒙文通教授著《古地甄微》中则言：长江在古代虽为原流，而无益于交通，其文化落后，殆以此故，考之春秋，吴楚之战，楚之陆军，自淮而不至江，水军，亦至淮而不曰江。惟吴亦然。其意也在贬低古蜀文明而也。

澜沧江发源于古蜀西部，丛山之中，流经昌都、入老挝至柬埔寨注入印度洋。怒江与澜沧江平行是古弱水亦注入印度洋。上述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流域，上古属于古蜀国的属地。因此有特稿言：与三星堆相距 1000 公里以外的越南，还发现了玉牙璋、玉璧、玉瑗、陶豆等大量与三星堆相同的器物。这些器物应是古蜀国与这些地区有交流，有影响的结果。这样的交流，是古蜀王国独有的内含，与中原文化互不相涉，没有牵连。

1、再论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金色“名片”

三星堆文明考古学，与古史学相结合，中华民族的根脉文化，会迎刃而解。如李学勤教授于 1993 年撰写的《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该论文是近百年来对疑古思潮拨乱反正的宝贵警言，希深思其意：

“这里我想趁机会向大家推荐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同志写的，叫《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论文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很多人认为《禹贡》是非常晚的作品，是春秋时期孔子写的，那么怎么对《禹贡》九州进行考古研究呢？我觉得这篇论文的贡献在于，它用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文化体系的理论，去解释《禹贡》。换句话说，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若干个文化圈，以这些文化圈，与《禹贡》讲的九州逐一对比，从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出《禹贡》九州绝不是想象杜撰，而是有关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进一步如果把较早的青铜器文化的文化圈，也结合考虑，对《禹贡》的价值或许还可以有更深的认识。这样说来，我们对于黄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

李学勤教授还曾以《禹贡》梁州的青铜贡品，来佐证三星堆的青铜器相互印证是可信的。如果再把老子隐意著的《山海经》条条经文记载，黄帝和嫫祖出生在上古蜀梁州，与今天考古学家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紧密结合的研究，中华文化的根脉就迎刃而解了。

如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九枝青铜神树，明是指中华民族的九代先祖。与老子隐意著《海内经》九丘其意相同，其文云：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神民之丘。该九丘明是中华民族历代先祖的名讳。又如《山海

经·海内经》云：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橰，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暱爰过，黄帝所为。这条经文袁珂本有详细注解。

①建木：生长在都广之野，都广即成都平原。
②百仞无枝：即是建木，怎么没有枝叶呢，明在老子的笔下，此木不是木类，而是隐意寓言。像这样的寓言在《山海经》中比比皆是。
③九橰：通属：系属也，昭穆相次序也，如亲属。指九代亲属。
④九枸：郭璞注，根盘错也。《淮南子》《说林篇》曰：木大则根枸。喻意九代亲属也。
⑤麻：麻之子实，喻意九代子孙。
⑥如芒：大貌，宅殷土芒芒，尤言黄帝子孙众多。
⑦大暱爰过：大暱：即伏羲氏，郭璞注：言伏羲于此经过。郝懿行云：伏羲生于成纪，云此不远，需得于四川成都平原经过。
⑧黄帝所为：郭璞注：此为者当是施为也。言黄帝为宇宙最高统治者，在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今之成都平原所构造的中华民族史。

再如，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头羊首，与老子隐意著《山海经·岷山之首》“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基本相合。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头羊首其意是龙头是黄帝的象征，因为三星堆文化实质是黄帝文化，岷山是黄帝的故乡。羊首是因黄帝的先祖发源于青藏松潘高原以牧羊为生的山岳民族，故以羊首为化身。

老子隐意著《中次九经》：凡岷山之首，自女儿山，至于贾超之山，其神状为什么是马身龙首呢？因“马”属于“天驷”者，房宿之别名，《尔雅》天驷房也。郭璞注：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按房宿在二十八之中，为苍龙七宿之一。故马首是黄帝的化名，与黄帝称龙首是一致的，其意相同吻合。

又如：《三星堆研究第二辑》记载：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有青铜雄鸡、玉璋、玉琮和玉琮。与老子隐意著《山海经·五藏山经》由 26 座排头首山，统率全国 451 座山系，在 26 座排头首山中，其神状皆为龙首的，有 7 处，祭祀用一雄鸡的有 10 处，用玉类祭祀的有 12 处，用羊祭祀的权 2 处，用犬祭祀的仅 2 处。为何史书的记载与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如此吻合？不言而喻，说明老子隐意著《山海经》不是面壁，而是根据历代名家口碑相传的史事。

还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的青铜立人大像其形状：头戴花状高冠，冠顶中间似盛开的花形，两侧以叶。冠下段饰两周回字形纹图案，两两相对。立人粗眉大眼，鼻梁突出，嘴角下勾，方颐大耳。两耳垂下各穿一孔。脑后发际距冠下 9.3 厘米处，发际上方有两个斜长方形孔，似为插笄之孔。颈细长。左臂上举，左手置于鼻前，右臂平举，右手与胸平齐，左、右手腕各戴三个镯。双手极度夸张，握成环形，拇指特大，指甲突出。左手拇指

与其他四指相抵。右手拇指与食指、中指、无名指相抵，小指留外。着鸡心领左衽长襟衣。后摆星燕尾形。衣上右侧和背部主要饰阴刻龙纹，龙昂头张嘴，颌下有须，长颈，尾上翘。左侧主要饰回字形纹和异兽纹。左肩向右斜饰方格纹带，两端至后背结节。两小腿上各带一方格形的脚镯，赤足，五趾突出站立于方座之上，座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方座，方座四边以勾连云雷纹衬底，四周饰圆圈纹，中间浅浮雕凸出长三角云纹，在云纹中饰花蒂形纹。方座下由一倒置兽头连接下层座。下层座为梯形，素面。

立人像花冠高 17.7 厘米，冠下至足底人高 163.5 厘米、座高 78.8 厘米，通高 260 厘米。这个立人大像应是蜀王蚕丛，带着金面具，既代表王权，又代表巫师神权在祭祀先祖黄帝，其形像突出在眼神，横眉纵眼，鼻梁突出，嘴角下勾，方颐大耳。与《蜀王本纪》完全相同，《蜀王本纪》曰：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所谓目纵，其止竖直。喻意放任，不加拘束，纵目四望，横眉冷对。为什么史书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其眼神如此相吻合，不是巧合，而是史事的实录。

试问老子隐意著《山海经》记载，距今 5000 多年黄帝的事迹，然而老子是春秋时期距今 2600 年左右所记事迹，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如此吻合，答案只有一个，老子隐意著的《山海经》是信史，遗憾时至今日世人还不知《山海经》的作者是谁，再加之老子隐意寓言所著《山海经》喻意深奥，历代名家视《山海经》为神话奇书。

2、《三星堆研究·第一辑》研读

读《三星堆研究·第一辑》林名均撰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时代之推测”所云：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实可谓其属于新石器时代。惟陶器中有与城子崖之黑陶相类者，故吾人推定溪岸坑中所得之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远在殷周以前也。所言新石器末期即夏末商初时期，与《山海经》及《史记》所言与黄帝子孙有密切关系。

再读《三星堆研究·第一辑》林氏云：广汉遗物出土之重要，指出古代之蜀，向皆目为戎狄之域，必无文化可盲（《国策》记司马错伐蜀事，张仪曰：“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今观广汉出土诸器物，其制作之精工，实无逊于中土，加以玉器之使用，尤足显示其文化之崇尚复杂。由此可改变吾人对于古代四川之基本观念。广汉遗物与中原所得者有若干相关相似之处，则古代蜀中文化所受于中原文化之影响，实不难窥见其痕迹。

盖四川与中原之交通甚早，《世本》谓：顓頊母，蜀山氏之子，名昌仆。《史记·五帝本纪》亦谓：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

阳。其说虽未可尽信，然蜀之名早见于殷代卜辞，武王伐纣，蜀人预焉（见《尚书·牧誓》）。故谓四川与中原同为一系之文化，亦无可。则广汉遗物对于吾国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上，实甚有贵献也。由广汉出土之圭，可证明越绝书所称黄帝时以玉为兵之说不谬。旧解（轩辕黄帝传注）以玉为兵者，乃以玉饰其兵器，不知兵器真可以玉作，后乃改变其用途耳。如圭，琮，璧等物，均可作为读古籍之参考，而不为后世歧说所惑。

三星堆遗物之出土，仅只广汉之一小区，即有如斯之成绩表现，以此推之，蜀中埋藏于地下之古物，较此更古更重要而尚未经发现者，必有无穷之希望，可以断言。如后来在理番发现之彩陶，是则对于将来之考古学有莫大之关系。

3、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

笔者石云龙，与四川省嫫祖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杨万忠，于 2017 年 8 月拜访广汉三星堆文化博物馆，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就是黄帝和嫫祖文化，黄帝活动在岷山，嫫祖故里在盐亭。并赠四川省嫫祖文化促进会主办《四川省嫫祖文化》2015 年 11 月总第三期记载：石云龙撰黄帝活动在四川岷山，汶川布瓦遗址初建都在宝墩古城遗址的十大佐证，和嫫祖诞生在四川盐亭古西陵的二十二条佐证。

这位馆长语重心长地介绍：“目前有学者对三星堆文化有严重歧议，一说三星堆文化是受中原二里头文化影响传入，一说三星堆文化来源于西方外域文化”。这位馆长希望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继续深入研究，并赠送了 2005 年 11 月 24 日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为《三星堆研究》撰写的总序，第一辑、第二辑和第四辑采集卷等三本宝贵文献。

现将一说歧议三星堆文化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传入摘录于下：

这位学者说：“目前，在成都平原还未发现龙山时代之前的原始文化。龙山时代晚期在成都平原才出现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但在盆地周边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老家村文化、大溪文化等早于成都平原龙山时代的原始文化，相继进入盆地周边地区。同时，在三峡地区已有早于龙山时代的土著文化存在。成都平原的龙山时代晚期的文化的产生，可能和周边的原始文化有一定关系。二里头时期，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通过三峡地区进入四川。商代早、中期，三峡不仅是中原商文化进入四川盆地的通道，也许汉中盆地也是商文化进入四川的另一重要通道”。

他还说：“夏、商文化进入四川催生了古蜀文明，使古蜀文明在商代中、晚期发展到整个古蜀文明最辉煌的阶段。这两条中原入川的通道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秦、楚的逐渐兴起而日趋封塞，阻断了蜀与中原的联系，使蜀文明的发展度走向低谷，直

到战国早、中期古蜀文明才再度辉煌。秦灭巴蜀后，古蜀文明趋于衰落，秦的移民并未对蜀地的经济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为西汉蜀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这位学者认为，“目前，在成都平原还未发现龙山时代之前的原始文化”。所谓原始文化，即仰韶文化，以此否定三星堆文化的价值。

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分早期、中期和晚期。其具体年代上、中下年限代究竟该以什么年代较为准确，目前对仰韶文明的涵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定论。因此，中国史学大师李学勤教授于 1993 年撰文《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第五节慎重指出：“在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都做过领导工作的尹达同志，对古代历史传说的意义也给予很高的估价”。如他在逝世前最后一篇论文——为《史前研究》杂志撰写的发刊词，在《衷心的愿望》里指出：“应该揭示古史传说的历史背景和内涵，需要结合考古学作很好的研究”。

李学勤教授说：“我觉得尹达同志这些话不是轻易讲的，而是他几十年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和古史研究积累的重要经验。当然，怎样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个人认为，千万不可以简单地把某一考古文化同传说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样每每会造成误会甚至混乱。德国学者艾伯华说过：‘虽然考古学研究在中国已取得巨大进展，当以社会组织为研究主题的时候，考古学仍不是很好的研究方法。即使在欧洲，考古学研究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无法把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文化联系起来。发掘所得遗存的分布，显然与种族的分布不相致，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考古学家根据物质遗存复原了若干文化，以至试论这些文化的传播和迁移。不过迄今为止，任何把这种文化同文献记载的文化与种族结合的尝试，都仅仅是难于凭信的假说’。这番话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因为有位学者指责三星堆文化说：“目前在成都平原还未发现龙山文化之前的原始文化，其意是成都平原文化晚出”。其目的是为贬低三星堆文化的价值观。故此上文李学勤教授指出，研究上古文化时，应进一步把较早的青铜文化的文化圈也结合考虑，对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价值或许还可以有更深的认识。但这位学者又指出：“中原二里头文化通过三峡地区进入四川商代早中期，三峡不仅是中原商文化进入四川盆地的通道，也许汉中盆地是商文化进入四川的另一重要通道”。

这位学者真可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李学勤教授在 1993 年就撰文指出：“长期以来，大家讲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特别是作为文明早期的几个朝代，确实都建都在黄河流域。可是谈到文明的起源，

考虑到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应该认为长江流域有着同样的作用。最近我在一篇小文里曾读到有关问题，据《国语》黄帝之子有 25 人，其得姓者仅 14 人。《大戴礼记·帝系》详细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但《山海经》、《世本》、《史记》都记载的只是有熊氏黄帝三代中，有出生在古蜀”。这是李学勤对中华文明起源于古蜀的重要表态。

关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是指夏文化。这位学者认为：“中原的夏文化是通过三峡地进入四川成都平原，才有了三星堆文化”。但李学勤教授在 2005 年 11 月 24 日为《三星堆研究》写序也指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篇章。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说明蜀国始于黄帝，所谓二里头指夏朝，而夏朝之君大禹是黄帝的远孙。既然是黄帝的远孙，怎么能说三星堆文化是夏禹时代才传入的呢？这就叫好读书不求甚解，才闹出此笑话。

4、三星堆文化与近东文明

还有另一位学者对三星堆青铜器源出于近东外域写文章，标题该是《三星堆文化与近东文明》——这位学者说：“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不仅如此，即令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是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的”。

那么，这类文化形式究竟从何而来呢？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近东即指东南亚）。这三个证据，就是前面提到的青的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开始形成了青铜铜像文化传统。在乌尔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人头像。在尼尼微发现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的大型青铜人头像，小型工人全身雕像，还出土各种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在埃及，1896 年发现了古王国第六王朝法老佩比一世及其子的大小两件一组的全身青铜雕像。古埃及文献所载这类雕像，其铸造年代还可早到公元前 2900 年。中王国以后，埃及利用青铜制作各类雕像的风气愈益普遍，在卡纳克遗址就曾发现大量青铜雕像残片。在印度河文明中，摩中佐·达罗城址也发现了若干青铜雕像，包括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和青铜车，其中以一件戴着手镯臂钏的青铜舞女雕像驰名于世。

权杖起源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 4 期，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代前半叶。在以色列的比尔谢巴，发现了公元前 3300 年的铜权杖首，在死海西岸以南恩格迪的一个洞穴窖藏中发现铜权杖首 240 枚、杖首 80 枚。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用权杖标志神权和

王权的传统，在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中比比可见。

古埃及也有权杖传统，早王朝初期埃及文字中的形，便是权杖的象形。埃及考古中发现了大量各式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有学者认为与西亚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关系。后来全世界许多文化都用权杖标志权力，其最初根源即在美索不达米亚。这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至于黄金面罩，西亚乌鲁克文化时期娜女神庙出土的大理石头像，据说曾复以金箔或铜箔。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面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亦覆盖着金箔。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都饰以金箔，如乌尔王陵中的牛头竖琴，牛头即以金箔包卷而成，另外的几尊金牛雕像也以0.5-2毫米的金箔包卷。

埃及的黄金面罩，最著名的是图坦哈蒙王陵内发现的葬殓面具。迈锡尼文明中也屡见覆盖在死者头部的黄金面罩，有学者指出这种文化并非当地的文化形式，是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从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的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文化史学界所公认。

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在雕像人物面都形态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除开那些西南夷的形象外，高鼻、深目的若干面部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类人物，阔眉、杏叶大眼，颧骨低平，高鼻梁，挺直的鼻尖，大嘴两角下勾，下颌一道直达双耳后面的胡须。这些面部特征，与同出的各式西南夷形象以及中原、长江中下游商周之际的各种人面像明显不同，也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华南人扁宽鼻型的人头骨不同。很明显，如此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来源于外域文化。

这位学者还提出：“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相符。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较晚期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吸收了上述文明地区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成”。

此说是正理还是歪理呢？李学勤教授2005年11月24日，为《三星堆研究》撰序说：“我曾说过，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比’，在‘海因里希·施里曼’发掘之前，特洛伊只是荷马史诗中的神话，在保罗·博塔

发掘之前，尼尼微也仅见于基督教《圣经》，认为是神话虚构，三星堆的遗迹与之颇为相似”。李学勤教授对三星堆文化认定，是对古蜀本土文化的赞扬，而不是贬低。但这位学者有以“瑟瑟”对三星堆文化提出的歧议，其文是《“瑟瑟”来路觅踪》。

他说的是：唐代诗圣杜甫寓居成都时，曾写过一首《石笋行》诗，诗中说道：“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是恐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尚存……”——杜工部的疑问，导出了一个千古之谜：“瑟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

原来，瑟瑟是古代波斯的宝石名称，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中国古书关于瑟瑟的性质有不同说法，主要指宝石，又称“真珠”，明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唐时成都西门一带，先秦曾是蜀王国墓区所在，近年不断发现大批墓葬。杜甫说这里雨多往往得瑟瑟，足见当年随葬之多，又足见蜀人佩戴这种瑟瑟串珠之普遍。既称瑟瑟，当然就是来自于中亚、西亚地区，并且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而来。“瑟瑟”之词按中国古辞源，其意是：瑟①乐器，古为五十弦。弦各有柱，可上下移动，以定声之清浊高下也。②众多貌。③严密貌。④洁鲜貌。⑤与索近。

名词解：瑟瑟：①风声。②本草以为为宝石。③瑟调：乐曲也。④瑟谱：书名。⑤瑟瑟幕：其幕色如瑟瑟，说明中国的词意有中国的解释，怎么会与外国相近呢？以上两位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歧议，在《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江玉祥学者有很好的解答卷，题目是《老鼠嫁女》，其文言：四川民间流行的“老鼠嫁女”的情节，原来是这样的：

有一个耗子的女儿长大成人了。耗子（妈妈）想给女儿找个本领大的丈夫。她想：“太阳高高在天上，本领一定大，我把女儿嫁给他吧。”于是，他去找太阳提亲。太阳一听，双眉一皱说：“我不行，要是遇着云一来，就把我遮住了。”耗子便去找云，可是云又说：“我不行，要是遇着风一来，就把我吹散了。”耗子又去找风，风不安地说：“不行，要是遇着墙，就把我挡住了。”耗子又去找墙，墙又说：“遇着耗子，就要把我钻垮了。”后来耗子明白，还是自己的同类本领大，就把女儿嫁给了另一个耗子。（讲述、采录者：刘仙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遂宁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请学者注意：中国自古有句谚语：太阳仍是中国的大，月亮还是中国的圆。这两位学者为什么要崇洋媚外呢？为什么要抬高别人，贬低自己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哲学。近百年来，人类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和错误，造成了空前的无数灾难。

【0、结束语】

早在1982年全世界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联合国举行会议，共同商讨二十一世纪化解人类种种灾难的最好方法，他们的结论就是必须要回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当中才能找到解救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千年万世以来的源头。

这个源头就是二千五百年时，是老子、孔子生活的时代。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大孔子二十岁，大左秋明十五岁，大西方佛祖十四岁。孔子和左秋明在诸侯国做官，唯独老子在周王朝任守藏室的史官。他手中掌握了中国历代先王的历史资料。《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景王18年，后太子圣而早卒。周景王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位，子朝自立。诸侯攻子朝而立丐，为敬王，敬王不得入，居泽。王子朝执政四年，晋人率诸侯入敬王于周，逼王子朝为臣。后来王子朝被敬王杀害，又驱逐了老子，老子认为王子朝是先帝景王御封的皇位继承人，其他王子争位是叛逆行为。

老子故隐居古蜀而著《道德经》和《山海经》，尤因《山海经》多隐意寓言。其意深奥、难解，历代注家不知《山海经》是何人所著，直至2018年11月28日四川盐亭嫫祖故里一位草民石云龙，才从《山海经·中次七经》中，破解了老子自言是他隐意著的《山海经》，并言他为什么要著《山海经》，然而《山海经》不仅条条经文记载黄帝活动在古蜀岷山，嫫祖诞生在川此盐亭县，而且还记载了中国上古三皇五帝的众多史事，《山海经》是一本真正的历史经书。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是指人生道德行为之学，可是后来误导为道教之书。《道德经》中的“无为”古辞典解释是：谓能以德化民，无事于政刑。《论语》：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无为者，无事不为也。可是当今《新华词典》解译为：“道德”是道家消极的处世态度和哲学思想。意思是不主动地有所作为，听任自然发展变化。故此，老子所著《道德经》和《山海经》应重新注译，尤因涵意深奥、注译而任重道远。人类回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指的就是儒家孔子、老子所著的经典当中才能找到解救的方法。

因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孔子学院，从儒学中寻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 [1]石云龙、石小玉，《中华之母---嫫祖》，大众文化出版社，2009年2月；
[2]王德奎、赵均中，嫫祖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
[3]王德奎，“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文史杂志，2000（2）；

[4]王德奎，嫫祖文化研究与经济建设综述，凉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5]岳定海、王德奎等，嫫祖故里大揭秘，伊犁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

（石云龙 2021年5月27日）

3/6/2022